



中国断代专题文学史丛刊



明代文学思潮史

廖可斌 著



中国断代专题文学史丛刊

明代文学思潮史

廖可斌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明代文学思潮史/廖可斌著.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5

(中国断代专题文学史丛刊)

ISBN 978-7-02-011277-7

I. ①明… II. ①廖… III. ①文学思想史—中国—明代 IV. ①I209.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85806 号

责任编辑 李俊

装帧设计 陶雷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468 千字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9.5 插页 2

印 数 1—3000

版 次 2016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1277-7

定 价 5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5233595

目 录

导言 关于文学思潮史的写法	I
第一章 明代文学思潮发展的宏观背景：古典审美理想和古典诗歌审美特征的发展变迁	26
一 古典审美理想和古典诗歌审美特征的形成及其要素	29
二 从“比兴说”到“情景说”：先秦至六朝古典审美理想和古典诗歌审美特征的发展	35
三 “意境说”：古典审美理想的实现与盛唐诗歌的审美特征	39
四 理性化与俗化：古典审美理想的解体与中唐至南宋时期古典诗歌的分化和衰落	41
五 严羽等人的呐喊	53
六 南宋末至明前期古典诗歌的继续分化和衰落	57
第二章 地域文人集团的兴替与元末明初文学思潮的变迁	59
一 元代的知识分子政策和文化政策与元末文学中心的南移	59
二 元末吴中派	62
三 浙东派	75
第三章 江西派与台阁体	86
一 台阁与台阁体	87

二 江西派与台阁体	100
三 明前期的文化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与台阁体	115
第四章 景泰至弘治中期的文学思潮	124
一 台阁体的衰落	124
二 “景泰十子”等与新的诗文风尚的出现	130
三 复古理论的滥觞	139
第五章 茶陵派	143
一 茶陵派的形成	143
二 茶陵派的诗歌理论	145
三 茶陵派与复古派	153
第六章 复古运动第一次高潮兴起的历史条件及发展过程 …	155
一 复古运动第一次高潮兴起的历史条件	155
二 第一阶段:在茶陵派卵翼下	167
三 第二阶段:反刘瑾斗争及与茶陵派脱钩	170
四 第三阶段:作家群落	179
五 余波:六朝初唐派与中唐派	184
六 归宿:弃文入道	187
第七章 前七子的文学理论	192
一 强调诗歌的情感特征	192
二 重格调	210
三 提倡学古	218
第八章 唐宋派	234
一 唐宋派与阳明心学	234
二 唐宋派与八股文	253
三 唐宋派与严嵩及嘉靖中后期的党争	259
第九章 复古运动第二次高潮兴起的历史条件及发展过程 …	269
一 复古运动第二次高潮兴起的历史条件	269
二 第一个十五年	278

三 第二个十五年	305
四 第三个十五年	314
第十章 后七子的文学理论	329
一 古典诗歌审美特征论	329
二 古典诗歌体裁论	346
三 古典诗歌发展史论	354
四 古典诗歌创作论:意与法	371
五 关于王世贞的“晚年定论”问题	383
第十一章 浪漫文学思潮兴起的历史条件及其发展过程	392
一 浪漫文学思潮兴起的历史条件	393
二 浪漫文学思潮的先驱	409
三 浪漫文学思潮的盛行与公安派等	420
四 浪漫文学思潮的蜕变与竟陵派等	432
第十二章 浪漫文学思潮的美学理想与艺术风尚	468
一 否定现实	468
二 张大自我——第一个层次:重情	485
三 张大自我——第二个层次:追求主体精神的绝对 独立	492
四 以意役象	500
五 以意役法	506
第十三章 复古运动第三次高潮:复社和几社	513
一 复古运动第三次高潮兴起的历史条件	513
二 复社	520
三 几社	531
第十四章 复社和几社的文学理论	547
一 继承前后七子,重倡复古主义	547
二 重雅正	552
三 重情采和体裁法度	555

余论	明代文学与清代文学的关系	564
一	关于清人对明代文学的批评	565
二	明代诗学理论与清代诗学理论的关系	571
三	明代诗学对清代诗歌创作的影响	579
四	清代诗学理论与诗歌创作的转向	584
五	明代文学与清代文学成就之比较	588
六	对关于明清两代文学和文化之评价的反思	601
	主要引用参考书目	604
	后记	616

导言 关于文学思潮史的写法

—

文学思潮史与一般的文学史、文学理论批评史等一样,属于广义的文学史的一种类型。所有文学史研究的根本宗旨,都在于展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以至整个人类文学发展的真实面貌和历史过程,揭示人类心灵的基本构成及其变迁轨迹。文学史本质上就是心灵史,这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但不同类型的文学史,在展现文学发展的真实面貌和历史过程、揭示人类心灵的基本构成及其变迁轨迹方面,角度和侧重点有所不同。一般的文学史,其主要目标是尽可能完整地展现文学发展的真实面貌,因此它关注的重点,应该是作为文学史之主体的作家和作品,包括作家的生平经历、创作过程,以及文体、题材、主题、风格、表达技巧等。

文学理论批评史的主要任务,是揭示人们对重要文学理论问题的思考及种种文学观念发生和变迁的历程,因此它必须在文学领域中,侧重向内部、向深处推进,挖掘、提炼和分析人们对重要文学理论问题的思考,关注的重点是人们的种种文学观念。文学思潮史,顾名思义,其主要功能应该是展现文学发展的整体运动过程,因此它应立足于文学史的基本内容即作家和作品,结合文学理论与批评,侧重向文学的外部,即人们的文学活动、文学风尚以及文学与社会环境的关系拓展和延伸,重点关注的应该是人们的文学活动和文学风尚。

当然,这种区分是相对的。几种不同类型的文学史之间,涉及的内容有所交叉,但它们的大致分野总体上是清楚的。一般的文学史研究,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应该是文学史研究的主体。但文学理论批评史、文学思潮史等,也是必要和有益的补充。它们从不同的维度,对文学发展的历史进行观察和分析,综合起来,即可帮助人们对文学史的内部结构、整体面貌和历史过程获得更全面、深入、准确的认识。

单就文学思潮史本身而言,既以此命名,就必须遵循文学思潮史研究的一般原则,但又不能套用一个固定的模式,因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甚至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学思潮发展演变的具体情形都是不一样的。文学思潮史的演进有时主要体现为历时性的不同环节的兴衰嬗替,有时则主要体现为共时性的多个文学组团的相互冲突对立和渗透交融,更多的时候是这两种情形同时存在,纵向的嬗替演变与横向的相互影响缠绕在一起。就文学的内部因素与外在社会环境的作用而言,有时是内部某种因素如重要作家、文体、主题、题材、表达技巧的变化带来整个文学系统的变化,有时则是外部环境的某个方面如政治、经济、军事、学术、宗教、技术的变化造成了文学领域内的连锁反应。文学思潮的重大转变,有时集中体现为重要文学社团及其文学主张的出现,有时又集中体现为重要文体或代表性作品的问世,有时还体现为某种与文学有关的重大标志性事件的发生。

在影响文学思潮发展变化的诸多外部因素中,从长远的角度看,经济因素无疑起着决定性作用,但其他因素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尤其是在某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内,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往往并不显著,社会环境中的政治、军事、科技、学术、宗教等方面的变化,都有可能对文学思潮的发展变化起到决定性作用,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学说时一再强调的“平行

四边形原理”^①。我们在考察文学思潮发展变化的外部社会历史条件时,就不必遵循一种固定的模式,按照某种固定的顺序,始终将经济因素放在首要位置,然后面面俱到。因为这样做不仅使文学思潮史千篇一律,而且真正最重要的因素往往遭到遮蔽。我们应该按照历史发展的本来面目,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内,哪种因素起了最直接、最重要的作用,就把哪种因素放在首要位置加以考察和陈述。总之,我们必须根据研究对象本身的特点,选择有利的观察角度,设置合理的理论框架,采取相应的叙述策略。

二

如上所述,注重对文学活动的考察,是文学思潮史研究的一个特点。所谓文学活动,主要指文学家的文学活动,同时也指社会上的文学生活现象。文学家的文学活动,包括文学家提出各种文学理论主张、进行创作实践、相互交流、探讨和批评等等,集中体现为种种文学流派和文学社团现象,因此文学思潮史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各种文学流派和文学社团形成、演化和嬗替的历史。丹麦学者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潮》是文学思潮史研究的经典著作,他在序言中即表明:“在如今这部著作里,我的意图是,由研究欧洲

① 《恩格斯致约·布洛赫》:“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7—478页。

文学某一些主要的集团和运动，探寻出十九世纪前半期的一种心理学的轮廓。”该书即以探寻法国流亡者文学、德国浪漫派、法国文学的反动、英国的自然主义、德国的浪漫派、青年德意志六个主要文学流派的兴衰、嬗替和相互影响、渗透，作为考察十九世纪欧洲文学思潮的主线，他认为这些文学流派“是完全具有戏曲性质的形式的一个历史运动。成为我研究对象的六个个别的文学集团，完全等于一篇伟大戏曲的六幕”^①。

文学流派和文学社团两个概念的内涵既有交叉也有区别。文学流派可能是文学家主动自觉形成的，也可能不是文学家主动自觉形成的，而是后代文学评论家经过研究总结追认命名的；文学社团则是文学家们在世时主动自觉形成的。一个文学流派可能具有明确的文学主张，也可能只是在文学创作的文体、题材、主题、艺术风格上相同或相近；一个文学社团有可能是因为社团成员之间有共同的文学主张，或在文学创作的文体、题材、主题、艺术风格上相同或相近而形成的，也有可能主要是仅仅因为他们之间具有地域、家族、科甲、官职、年龄等方面联系而形成的。一个文学流派可能由一个或几个文学社团构成，也可能没有文学社团支撑；一个或几个文学社团也许构成一个文学流派，也许不构成一个文学流派。因此有时候一个或几个文学社团等于一个文学流派，有时候则不相对应。既形成了比较严密的文学社团组织形式，又构成了一个文学流派的文学社团，才是具有较高水平的文学社团，它们是文学思潮史研究必须重点考察的对象。当然，对没有形成社团的文学流派，和不构成文学流派的文学社团，文学思潮史研究也要予以关注。

这里必须指出，文学流派和文学社团并不能包含所有文学活

^① [丹麦] 该奥尔格·勃兰兑斯著，侍桁译《十九世纪文学主潮》，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页。

动。在任何时候,不属于文学流派和文学社团的文学活动都是存在的。但在比较成熟的文学形态中,文学流派和文学社团已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绝大部分文学活动都已汇入文学流派和文学社团之中,也就是说,文学流派和文学社团已经成为文学活动的主流。即使不属于文学流派和文学社团的文学活动,也往往会或直接或间接、或正面或反面地受到文学流派和文学社团即主流文学活动的影响。一般的文学史研究力求尽可能完整地展现文学发展的面貌,因此对一些存在于文学活动主流之外而又具有比较重要价值的文学现象,它也不应遗漏。而文学思潮史研究以考察文学发展的总体潮流为职志,因此它以文学流派和文学社团为主要关注对象就是合理的。

与以前各个朝代情形相比,明代文学发展的一个突出现象,就是文学流派和文学社团众多。重要的文学流派就有明初吴中派、浙东派、台阁体、茶陵派、明中叶吴中派、前七子复古派、唐宋派、后七子复古派、公安派、竟陵派、云间派等。至于文学社团,则现在可考的就还有数百个之多。^① 明代文学特别是文人文学的发展历程,基本上就由一个接一个的文学流派的兴衰和嬗替构成。中国古代早期文学发展过程中,文学家们总体上是分别进行文学活动,文学格局呈散点分布状态。因此各种文学史描述明以前各个朝代的文学发展过程,一般都以时代来划分,这表明当时的文学家之间,主要只存在时间上的外部联系,而没有其他更紧密的内在联系。近代以来的文学史在描述明以前各个朝代的文学时,也提出了一些文学流派的概念,如“山水田园诗派”、“边塞诗派”、“婉约词派”、“豪放词派”等,但这些都是由后人总结归纳出来的,当时的文学家都没有自觉的流派意识。明以前还有一些所谓文学流派,往往以

^① 何宗美《文人结社与明代文学的演进》(上、下编)考列明代(含元末)文人结社680余例,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9页。

一个代表人物的名字或郡望命名,如“江西诗派”,并不是说有一个江西的诗派,实际上“江西”就是指黄庭坚,所谓“江西诗派”就是指“黄庭坚一派”,即在一定程度上尊奉黄庭坚诗歌理论主张的那些诗人。直到明代的“茶陵派”,在一定程度上也还属于这种状况。所谓“茶陵派”,并不是说有一个非常紧密的文学团体。“茶陵”就是指李东阳,“茶陵派”就是指围绕在李东阳周围,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和追随他的文学家群体。严格地说,上述两类“派”,都还不完全是现代文学理论概念上的文学流派。人们用种种流派的概念来指称它们,主要是为了叙述的方便。至于后人因此把它们当成真正的文学流派来看待,则基本上属于以后律前造成的一种误会。

明代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文学流派和文学社团?经济的发展,市镇的繁荣,交通的便利,教育和文化的普及,刻书业的发展和文学传播快捷等,都是促成这种流派纷呈、社团蜂起现象的重要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文学本身的发展带来文学理论观念的自觉。也就是说,文学流派和文学社团众多只是外在的表现,而文学理论观念的自觉才是内在的实质。明代的大多数文学流派,特别是前、后七子和云间三子复古派、公安派和竟陵派等,都是一群文学家们在具有相当明确且基本一致的文学主张的前提下形成的。这些文学家具有强烈的流派意识,具有高度自觉的文学观念,并在这种文学观念的指导下进行文学理论的思考和文学创作实践,因此已完全符合现代文学理论中文学流派的概念。可以说,只有到了明代,中国古代文学才出现了真正的文学流派,才达到了文学理论观念的充分自觉。而这一切,毫无疑问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已进入高度成熟阶段的标志。

由于明代文学流派和文学社团已成为文学活动的重要场域,文学家们提出种种文学主张,投入创作实践,相互交流、探讨与批评等,基本上都在文学流派和文学社团的框架下进行,众多文学流派和文学社团的兴起、蜕变、衔接和嬗替,已构成文学思潮演进的

主体脉络,而整个社会上的文学生活现象,如文学作品的刊刻出版、广大读者的阅读风尚和批评取向等,一方面对文学家的文学活动产生反馈作用,一方面也受文学家文学活动的主导。因此考察明代各个文学流派和文学社团的形成和演化过程,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冲突、相互激发、相互渗透、相互嬗替的关系,就成为考察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学活动以至整个文学思潮史的重要角度。

三

文学思潮史研究力图沟通文学与其外部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对文学发展的总体态势作出整体性描述,文学发展的外部社会环境以及它与文学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就成为文学思潮史研究必须予以特别关注的另一个重要领域。一般的文学史以及文学理论批评史,也都要考察文学或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外部社会环境及其对文学或文学理论批评的影响,但一般仅仅把它们当作文学或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背景予以勾勒。文学思潮史的研究与此有所不同,直接影响文学发展的外部社会环境因素如政治、经济、军事、学术、宗教等方面的变化,以及它们与文学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需要直接面对和重点描述的对象。简言之,一般的文学史的主体是文学本身的发展史,文学理论批评史的主体是文学理论批评本身发展的历史,而文学思潮史在一定程度上乃是文学本身(包括文学思想、文学创作)与外部社会环境之间互动关系的历史。正是文学本身与外部社会环境种种因素之间互相生发、互相缠扰、互相挟裹、共同推进的过程,构成了文学思潮发展史云卷浪飞、起伏奔涌的生动景观。

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历史,我们会发现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特别密切,这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我们长期生活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环境中,可能对这一特点已习以为常、习焉不

察。但如果我们有比较的视野，将中国文学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学相比，这一特点就会特别凸显出来。这一特点的形成，与作为文学创作活动之主体的中国古代士大夫的特殊身份有关。西方曾长期处于封建社会阶段，权力为各个诸侯、贵族所垄断，知识分子很少能够染指，因此他们大多从事宗教、文学、艺术、技术、商业活动。西方的文学艺术家，从贵族、经院学者、贵族的门客到靠版税维持生活的现代作家、艺术家，专业化程度一直比较高。与此相应，西方文学艺术与政治的关系一直不是特别密切，对文学艺术影响最深远的以前是宗教，进入现代工商业时代后，再加上资本和市场。中国则自秦汉以后，随着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君权专制政治体制的形成，权力高度集中，贵族阶层日渐式微，最高统治者需要有一大批出身平民阶层而又具有一定文化修养的人才协助其管理庞大国家，于是旨在培养、选拔、任用这些人才的一系列教育、选举、职官制度也应运而生并日渐完善。在这种体制下，作为“士”即有知识有文化的人的人生目标，就是成为“大夫”即作官。于是，与君权专制相适应，一个庞大的士大夫阶层逐步形成。这是一个身份特殊的群体，它的名称就很奇妙：作为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之指称的“士”，与作为官员之指称的“大夫”连在一起。但在长达两千年的中国古代社会里，这却是最普遍、最稳定、最正常的现象。于是从秦汉之际开始，相对独立从事思想文化事业的“士”阶层基本不再存在，而成为官僚阶层的附庸，总体上进入政治体制内。这是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特点，西方社会似不存在这样一个阶层。由于这一群体在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曾发挥重要作用，因此考察这一群体的身份定位、心理结构和社会功能，是考察中国古代种种社会现象和历史进程的一个重要角度。^①

^①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自序”中说：“中国史上有一个源远流长的‘士’阶层似乎更集中地表现了中国文化的特性，也似乎更能说明中西文化的异质之所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

中国古代文学家基本上都属于士大夫群体，只是有的处于其上层或中层，有的处于其下层而已。中国古代文学家很多都做过不大不小的官，与西方文学史相比，这一点显得特别突出，西方人觉得很新鲜，于是他们翻译编纂的关于中国古代文学的书籍，在介绍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时，都会注明是“官员、文学家”，而对此习以为常、觉得不言自明的我们，反而又会觉得很奇怪。进入士大夫群体上层或中层的文学家，多兼官员和学者、作家多重身份，多进入仕途，有的甚至在宦海沉浮了一辈子。处于下层者内心的自我定位也把自己设定为这样的身份。他们中很少有人把自己看成是纯粹的文学艺术家，几乎都热衷于政治。从高处说，他们都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从低处说，在政治上光宗耀祖对他们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功名利禄子女玉帛之奉也毕竟是人生中最实在的东西。于是他们就自然要卷入官场的角逐，政治便成为他们的整个生活——包括文学创作和其他文学活动——中起支配作用的因素。文学家们以文学作为参与政治的工具，描绘政治理想，抒写政治抱负，阐述政治见解，展示政治态度，发泄政治上失意的苦闷，揭露社会黑暗，表达对民生疾苦、国家命运的担忧，等等。政治始终是中国古代文学的轴心，因此现实主义始终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主流。当然，这一文学传统有得有失，相对来讲，中国古代文学对人性、个人自由、爱情、自然、幻想世界等的探索和描写就不够细致深入。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就必须特别注意它的这一特点，特别注意观察它与政治的互动关系。

政治对文人和文学的影响大致包括两个层面，一是重大社会变革或总的政治氛围对文人和文学的影响；二是某些政治制度的确立，某种政治事件的发生，甚至某个重要政治人物的进退对文人与文学的影响。我们在这里要着重强调的是后一层面。因为以前的文学史研究并非没有关注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但大多停留在对前一个层面的一般性描述上。如果我们对每个历史环节文学与政治的关

系进行深入具体的考察,许多文学现象将会得到更透彻的说明。

明代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尤其密切,往前看也似乎只有宋代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密切程度可与之相比,这是因为宋、明两代士大夫的政治参与度更高、在政治上发挥的作用更大。明代文学思潮演进的每一个环节,几乎都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直接关系。元末明初文学思潮的变迁,很大程度上即体现为依附张士诚集团的元末吴中派与追随朱元璋集团的明初浙东派之间在文坛上主导地位的嬗替,而这与元明易代和朱元璋集团消灭张士诚集团直接相关。继明初浙东派而起的台阁体垄断明前期文坛长达百年,这又是洪武、永乐两朝实行高压的知识分子政策和文化政策以及朱元璋废除宰相、建立内阁制度及翰林院庶吉士制度等政治事件的直接结果。前七子复古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与明孝宗相对开明的政治行为及明武宗初年发生的宦官刘瑾擅权事件有密切联系。嘉靖年间后七子复古运动卷土重来,又与当时反严嵩的政治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与之抗衡的唐宋派作家,则与严嵩集团比较接近。从嘉靖、隆庆到万历年间,唐宋派、后七子等文学流派的此消彼长,竟与张璁、夏言、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等首辅大臣的升沉进退息息相关。明末复社、几社等文学社团,又积极投身到反对魏忠贤“阉党”余孽和抗清救明的政治斗争之中。即使是一些看起来与政治斗争关系不那么紧密的文学家和文学现象,其实与政治之间也存在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如归有光的政治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即取决于徐阶、高拱的暗中操纵;严嵩的盛衰决定了胡宗宪的荣辱,而后者又决定了徐渭一生的遭际。只要读一遍《汤显祖诗文集》,就知道汤氏曾怀有多么远大的政治理想和人生抱负,在关注朝中是非、朝臣起落和自己的进退上花了多少心事。上《论辅臣科臣疏》一事决定了他的人生走向,如果这件事情没有发生,他将会走一条怎样的人生道路,是否还会写出不朽之作《临川四梦》,都是一个问号。而他之上此疏,乃是受张居正、申时行相继执政期间朝